

潮新闻·钱江晚报:中国有很多自成文化体系的地域,比如读这个三部曲的时候,我也想到了河南籍作家梁鸿的非虚构作品“梁庄三部曲”,中国在梁庄,梁庄在中国,当我读完您的“尘世三部曲”时,不由地也有相似的感叹,中国在老君山巴地,老君山也在中国,时代也是同样的城乡大迁徙的时代。但巴地与中原在地域特征上又有如此鲜明的不同,你觉得跟地域文化关系紧密的文学作品,地域特征以及人的特征一定要写得很鲜明吗,还是可以模糊地域,只展现共同的人性?

罗伟章:写作者的任务,是在鲜明的特征里写出共同的人性。如果没做到这一点,特征就会失去价值。但有鲜明的特征总也是件好事,当今世界,陌生化几乎已经消失了。不过我还是要说,一个作家,要对“特征”引起警惕,在最根本的意义上,它帮不上你多少忙。尤其要警惕的是,不能把“特征”用来讨巧。

潮新闻·钱江晚报:“巴文化”的核心是什么?在阿来的《云中记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

代祭司,《寂静史》中的女主人公是个女祭司,是否当地确实存在着这些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?连杨浪这个人物,我觉得也接近于一个活的“非遗”,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了吗?

罗伟章:这样说很有意思,也很对,是把杨浪这个人物提升了。是的,那样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确实存在,但在我看来,是否存在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,他们身上所蕴含的,是否也是我们身上所蕴含的。“巴文化”的核心有人概括过,说“大山大水,重情重义”,这显然不足以概括。我觉得着重体现在他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,对待卑微之物的态度,对待死亡和灵魂的态度,我的“三部曲”特别是《声音史》和《寂静史》,写出了这种态度。

潮新闻·钱江晚报:在你看来,“巴文化”与现代社会的碰撞,是必然的毁灭于无形,还是确实有抢救的必要?《云中记》的村庄是地震外力的撞击一下子毁灭的,而《声音史》你写了村庄一户户“空掉”的过程,直至最后剩下一男一女。读《声音

史》,感觉有一种你在把《清明上河图》一笔笔抹掉,像个行为艺术。这一笔笔减去之时,你内心稳得住吗?

罗伟章:如果我写之前能听到你这些话,心里的清晰度可能更高些。写的时候倒是稳得住,因为不仅有抹,还有添,那些被我们在喧嚣的心境下忽略掉的,现在都被发现了,都“生长”起来了。最后剩下两个人,一男一女,这也算是一个寓言,这个寓言有更冷酷的一面,就是他们本身是不能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”的,因此,这两个人的村庄将被彻底抹去。不过,杨浪是有信念的人,他不断清扫村子,收拾碎砖烂瓦,是寄希望于远行者的归心。这种希望当然是不可靠的,他、他们和千河口村的一切,可能都将等待下一次发现。这是另一个寓言。

你问有些东西是否有抢救的必要,在我看来,形式上的抢救是没有意义的,真要消亡的,抢救也无效。然而,当我们在回望当中看见了自己的来路,甚至苍茫云海,啥也看不见,单是回望本身,就是一种自我寻找和自我审视。

「写小说和读小说之所以快乐,就是突破限制。那些人物,无非是生活在乡村,他们都是人,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灵魂底子。」



采访时,抓拍到罗伟章大笑的一瞬。蒋文俐 摄



颁奖现场,罗伟章和毕飞宇拥抱。徐彦 摄

2

潮新闻·钱江晚报:三部曲的每一部,表面上都在写乡村,但读者又能看到都市的影子。似乎乡村与城市在您的小说中是很难割裂的。您对自己的小说,似乎并不愿意过于定位到“乡土小说”上去?

罗伟章:也不仅是“乡土小说”的定位,我其实不主张一切定位,任何定位都是限制。写小说和读小说之所以快乐,就是突破限制。那些人物,无非是生活在乡村,他们都是人,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灵魂底子。

潮新闻·钱江晚报:《寂静史》中,一方面是借林安平这个女祭司写传统的消亡,另一方面借下去采风的文化馆员“我”写都市人在现代生活中的迷失,使他们互为镜像,最后写走出大峡谷的“我”反思自己游戏人间的世俗生活,那么您要表达的是乡村堪当都市欲望迷失者的救赎之途呢,还是他们在各自的困境中难以走出?

罗伟章: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,也都面临各自的选择和承担,林安平是,“我”也是,所以无论乡村还是都市,都不天然地具有迷失和救赎功能,所以最后就看我们自己了。人和人之间,能相通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,正因为有限,才值得去寻找,也才能给我们辛辛苦苦写小说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。当然归根到底,作家写作,是对自我生活与心灵的反思。

潮新闻·钱江晚报:《声音史》的阅读体验非常惊艳,感觉是给中国的当代文学史添了一笔独特的人物形象。杨浪这个人物仿佛是最卑微的,又是村庄最后的守护人,又是灵性的,他能跟大自然“通灵”,这样一个神奇的“巴人”是从何而来的,您是否借鉴了一些国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呢?可能很多读者在阅读《声音史》时会想起《百年孤独》。

罗伟章:我写作这部小说时,既没想起马尔克斯也没想起卡尔维诺,也没想起魔幻现实主义,但我不能因此就说,自己完全没有借鉴他们。借鉴这件事许多时候是不知不觉发生的,你的阅读版

图,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你的智识版图,包括角度,包括视野。这正是伟大的前人们赋予后人的恩泽。后人要做的,是在前人的肩膀上站起来。

潮新闻·钱江晚报:您的创作是否在突出某种魔幻和荒诞,使小说具有鲜明的个人气质?

罗伟章:魔幻和荒诞也不能显现出个人气质,一种写作技法跟一种知识一样,一旦被发明、被揭示,立即就会变成了常识,所以它们跟个人气质无关。我觉得作家不要急于去操心个人气质,那会走上窄路,伟大的作家们大多不具备鲜明的个人气质,他们更看重同理心,更看重灵魂的宽度和厚度,更看重与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。

潮新闻·钱江晚报:三部曲中,浪漫主义无处不在。还有写笑特别有特色,在您笔下,火也会笑,食物也会笑,各种动物植物也会笑,是否是作者身上的一种幽默感和浪漫主义精神,赋予了《三部曲》中那个自然和乡村社会,以及其中的卑微之人?

罗伟章:是我,也是他们,当然落实到小说中,就只能是他们。他们特别能体察“物”的心情,不得已要去砍伐一棵树,先要向那棵树道歉。我觉得这才是丰厚的世界,也是真实的世界,比我们的实用主义哲学、唯我所用的哲学,要丰厚真实得多。

潮新闻·钱江晚报:读完三部曲后,有种特别的感动,我觉得“三史”中有一种众生平等的世界观,无论是自然中的微末,还是乡村社会的三教九流,包括走出乡村的种种生计操持者,作者的笔触做到了对每一个人和物的平等之心,都有温柔怜悯,这是您世界观的表达吗?

罗伟章:是的。比如我上班的时候,在路上见到一只鸟在前面啄食,我会绕着路走,不去惊扰它,或者等它飞走了我再走。见到一辆倒在地上的共享单车,我会把它扶起来,这不是“做好事”,而是觉得,它那么倒着,一定是不舒服的,也是不尊严的。在一些古建筑里,见石兽托着巨大的石碑,托了数百年上千年,也会让我心生怜惜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世界观,就是认为,“生命”这个词,流贯于万物之中,平等不是观念,而是天然。